

#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 体系构建研究

钱文荣 申小亮 赵宗胤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是直面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典型事实的概念,具有中国经验事实的指向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性、扩散中国智慧的传播性。从政策关键词提取政策性概念、政策性概念学理升华至规范性概念、规范性概念理论对话形成标识性概念,可以作为一套提炼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完整逻辑。对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体系化构建,一方面,要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引领,深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将历史的发展逻辑转化为标识性概念的时序逻辑;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林经济管理的交叉学科优势,在学科范围内扎实推进基础知识、前沿知识研究,不断拓宽学科范围边界,开展交叉知识研究,着力打造标识性概念的语义网络。

**[关键词]**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构建

## 一、引言

人类社会发史与知识体系演变史相辅相成,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文明形态,必然要以新的知识体系来推动这一发展进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原始人类社会以狩猎采集野生动植物为生,在这种人与自然的漫长交往中,人类逐渐积累起对自然的直观认识,发展出驯化野生动植物的能力,由此带来的粮食生产、食物剩余、定居生活与人口增长奠定了人类社会向农耕文明转变的基础<sup>[1]58-65</sup>。在生产水平较低的古代农业社会,人们主要从感官层面来把握日常生活所及的现实世界,对现实的理解往往充满感性与经验的色彩,知识体系主要表现为各种“经验形态的知识”;伴随近代文艺复兴、教会创立大学、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萌芽等一系列事件的综合影响,科学主义的兴起使人类知识体系在形态上突破了经验的束缚,迈向以探寻经验背后普遍存在的规律与原理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原理形态的知识”<sup>[2]</sup>。进入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全球扩张将人类社会带入工业文明时代,为服务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需要,

[收稿日期] 2025-07-04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5-08-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重大专项(2024JZDZ063)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作者简介]** 1. 钱文荣(<https://orcid.org/0000-0002-4556-9300>),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问题等相关研究;2. 申小亮(<https://orcid.org/0009-0000-5285-3337>)(通信作者),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土地制度与农村发展、农业经济思想史等相关研究;3. 赵宗胤(<https://orcid.org/0009-0003-0263-6707>),男,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问题和农业转移人口相关研究。

技术中心主义促进了应用型技术知识的全面发展,知识生产的目的是加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人类知识体系也因此表现为各种“指令形态的知识”<sup>[3]2-5</sup>。围绕工业化建构出的知识体系与现代化发展目标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与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也深受这一思路的影响,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借鉴吸收国外知识体系的基础上,走出了独具本土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局面。然而,从人类社会发展与知识体系演变的历史规律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仍未在知识层面得到系统化、体系化的表达。因此,构建能运用中国素材、回答中国问题和表达中国立场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sup>[4]</sup>。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史亦是一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史。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相得益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部门,在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sup>[5]26-27</sup>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学习借鉴苏联模式为主,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以集体化的形式展开,但受制于农业集体化经营的低效率。改革开放后,中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标志,使农业重回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并带来农业农村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相伴的是,改革开放前为服务计划经济体制,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借鉴苏联农经教学科研体系,运用政治经济学概念与原理来分析农业农村的发展问题;改革开放后为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通过系统引进西方农经学科的主流概念、理论和方法,以及教学科研评价标准,逐步掌握了与国际农经学界接轨的学科知识体系<sup>[6]</sup>。应当看到,西方农经学科知识体系本质上是基于发展主义理念的一套话语叙事。二战结束后,发展主义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打造成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发展、完成赶超的单一途径,通过把农业、农村与农民有意“问题化”的手段,使农业农村发展自主性的丧失和依附性的形成具备了合理化依据<sup>[7]128-132</sup>,这也构成了西方农经学科的主流叙事逻辑。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对发展主义唯经济因素一元论的全面反思,坚持将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向社会、政治和自然等领域进行全面延伸,力求在城乡融合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与农民现代化的融通<sup>[8]</sup>。显然,运用西方农经学科知识体系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正当其时。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项充满长期性、复杂性与系统性的工作,以提炼标识性概念为突破口,并将其以体系化的方式加以构建,是这一工作顺利开展的逻辑起点。知识体系是人类根据以往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长期观察与思考,是将积累起的认知成果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文化语境中进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它不仅体现了某一民族或地域的知识总和,也是在分类、组织之后形成的结构化知识序列<sup>[9]</sup>。不难看出,知识体系的形成绝非易事,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更是充满了挑战。对学科与知识的关系而言,知识分门分科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但直到17、18世纪欧洲国家内部科学学会的成立才标志着知识划分的历史性突破,这也直接促成了19世纪以来按照研究领域进行专业划分的现代学科的产生,学科形成的目的是以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理念在同一学科内部进行知识的专业化生产<sup>[10]13-20</sup>。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身来看,农林经济管理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在依据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的同时,也因研究领域和内容的差异而必然涉及农学、社会学等相关理论知识<sup>[11]388</sup>,这也进一步增加了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难度。然而,科学的分析建立在清晰的概念之上,任何一门学科在构建其理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确立自身的概念体系<sup>[12]90</sup>。依照理论知识体系生成的这一规律,以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构建来推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鉴于此,本文围绕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及其体系化构建两个方面展开,通过揭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与构成要素,形成一套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提炼逻辑,

并根据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结构特征,提出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策略。

## 二、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与构成要素

正确理解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前提条件,这需要结合概念、标识性概念和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等相关内容进行全面阐释。同时,需遵循一般意义上的概念构成要素,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构成也应该包含恰当构造的概念语词、清晰定义的概念内涵与明确划分的概念外延三大要素。

### (一)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

概念是人类通过与客观世界的接触,在认识层面形成的能够反映某类事物特有属性的一种思维形态<sup>[13]18</sup>。人类生活在由不同事物组成的客观世界里,包括物质的和自然的,各种事物不仅自身具有一定的性质,还与别的事物存在一定的关系,事物的性质与关系构成事物的属性,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又可归为一类事物,某类事物具有而其他类事物不具有的属性就是这类事物的特有属性,概念本身就是人类对某类事物特有属性的思维刻画。概念的产生源于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人类认识从量变到质变、生动直观到抽象思维、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转变。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起初人类借助感官与客观世界交往,人脑中形成对事物属性的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印象;随着劳动协作场合的增加,人类用语言来向他人指代某类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由此发展出抽象思维能力,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sup>[14]303-316</sup>。所以,概念是人类在实践中产生的感觉、知觉和印象的累积,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前提。

标识性概念是指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历程展示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发展实践为依托,以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根本遵循,凝练出能够鲜明指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与发展成果的概念。具体而言,标识性概念必须具备概念的原创性和标识性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概念的原创性方面,标识性概念是通过深入分析与反思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一般性概念,揭示这些概念的“所指”和“能指”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存在的偏差,并根据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与文明内涵的概念,以概念重建的方式引领新一轮“术语革命”;二是在概念的标识性方面,标识性概念不仅要兼顾概念原创性的特点,还要能经由判断、推理与论证的科学分析过程,将中国发展的经验事实提升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这一新的知识体系与现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相比,可以显著标识出中国特色实践经验具有的时代价值和文明价值<sup>[15]</sup>。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是基于农林经济管理的学科属性,立足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广泛实践,以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提炼出能够直面中国本土性和创新性的农业农村发展经验事实的概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以标识性概念来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而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林经济管理理应在学科层面展现自身的使命担当,以学科标识性概念来推进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通常来说,任何一个现代学科都是通过对研究领域的专业划分,建立学科自身的研究范围与研究边界,使学科内部的科研人员能够排除本学科之外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并紧紧控制他们的研究对象来发掘现实世界存在的客观规律。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标识性概念就是要围绕学科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如农林部门社会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宏观管理政策和微观管理决策等,对照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经验,提炼出具有中国现实指向性的概念。

## (二)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构成要素

在科学研究领域, 语词、内涵和外延是概念构成中的三大基本要素<sup>[16]</sup>。概念是辨别不同类型事物的一种无形、抽象思维形态, 早期人们为了进行交流会借助有声的语言来传递与思维对应的事物, 文字的发明使人们逐渐能够利用有形的语词来表达头脑中的概念。科学研究为了避免概念所指之物可能产生的混乱, 会通过定义概念的内涵来界定具体概念所指的事物, 概念的内涵一旦得到界定, 就可进一步划分出特定概念能够包含的其他类事物, 这就是概念的外延。以上关于概念构成的一般性分析是为了说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构成也必须包含语词、内涵和外延三大要素。

语词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语言符号, 是由词、词组或短句构成的术语。概念的语词呈现往往会因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等的语言习惯和构词方式而存在一定的差异<sup>[17]</sup><sup>56</sup>, 科学研究通常要求对语词进行恰当构造以方便沟通与交流。近代“西学东渐”造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充满大量日本“和制汉字”专业术语<sup>[18]</sup>,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也深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以新一轮“术语革命”来打造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不可或缺。语词构造可以通过概念限制法来体现传承性, 如“扶贫”与“精准扶贫”, 也可通过创造新的术语来展示颠覆性, 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当然, 同一语词可以表达不同概念, 不同语词也可以表达相同概念, 关键就是要对概念的内涵进行清晰界定。

内涵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所指的事物, 通过概念的定义来加以明确。概念内在的思想内涵与概念外在的语词是不同的, 定义的目的就是实现概念的内涵与概念的语词相互连接、相互印证<sup>[19]</sup><sup>156-157</sup>。具体来说, 被定义项就是概念的语词, 定义项就是以一定的逻辑方法将概念所指事物的特有属性用文字形式加以表述, 让人们能按照概念内涵的定义来把握住概念语词所代表的某类事物。所以, 概念定义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概念所指事物的明确性。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内涵就是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 农业农村发展领域表现出的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典型事实, 这需要对概念的内涵作出清晰、准确、完备的定义来赋予概念语词以鲜明的“中国印记”。

外延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能指的事物, 经由概念的划分来加以完成。在明确定义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可以围绕概念所表征的某类事物的特有属性, 按照一定的标准或依据划分出具有相同特有属性的其他子类事物, 形成概念大小类别之间的“属一种”关系, 其中的划分标准往往根据实践要求或研究需要来决定。比如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领域中, 农业经营学将“农业经营”定义为“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sup>[20]</sup><sup>6</sup>, 如果以社会和物质资料的不同组织方式作为划分依据, 从“农业经营”这一概念出发, 又可进一步细分出“小农经营”“企业经营”“公司经营”三种不同的模式<sup>[21]</sup><sup>1-3</sup>。可以认为, 概念内涵的界定是概念外延划分的前提, 而概念外延的划分又可增强对概念内涵的理解。

## 三、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提炼逻辑

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在本质上是以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事实为现实关照, 以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为理论目标, 以促进中国本土自主性的农业农村发展实践为终极关怀, 理应具有中国经验事实的指向性、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有效性和扩散中国智慧的传播性。根据上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本质特征, 本文认为, 党和国家历史上发布的, 尤其改革开放后出台的关于指导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文件, 可以作为提炼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原始“资料库”与逻辑起点。具体而言, 首先, 农业农村发展主要由代表国家意志的政策

文件来推动<sup>[22]</sup>,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关键词提取形成的政策性概念就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满足中国经验事实指向性的特征;其次,政策性概念本身代表了党和国家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方针,只有在经受严格的科学研究检验并能形成相应理论知识的政策性概念,才具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有效性的特征,也因此能够上升到满足学术研究规范的规范性概念;最后,规范性概念虽然有助于理论知识的构建,但还需要与现有西方理论知识体系进行深度理论对话,全面揭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与中国理论知识的贡献性,这样,规范性概念才能真正成为一种标识性概念,才会具备扩散中国智慧的传播性特征。按照以上逻辑,最终可以形成“政策性概念—规范性概念—标识性概念”这一提炼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完整逻辑链条。

### (一)从政策关键词到政策性概念:立足现实关照的经验事实提取

政策性概念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对党和国家农业农村发展政策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力求夯实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现实关照。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农村发展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体部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自下而上的探索、国家自上而下的追认拉开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为核心的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序幕。在随后的农业农村发展进程中,党和国家针对历史形势的变化和农村基层民众的需求,通过政策层面的正确引领来深刻把握发展的方向和重点,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sup>[23]</sup>,并依次创造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发展、农民进城务工、农业规模经营、城乡融合发展等道路模式与实践经验<sup>[24]</sup>。由此看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史从根本上反映了“发展型政府”与“创新型农民”之间的有机统一。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用以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文件,不仅是党和国家治理理念的阶段性呈现,还不断塑造出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是提取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政策性概念的原始“资料库”。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农村发展政策会随着时代背景、发展阶段及战略目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利用政策文本分析提取关键词以生成政策性概念的过程中,一是要确保相关政策收集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比如历届党的三中全会、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等,这需要围绕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来打造一套专属的政策“资料库”;二是要明确政策性概念的历史演变逻辑,政策性概念既是对国家意志的语言刻画,也是对农业农村实际问题的回应,需要站在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全面认识政策性概念之间的逻辑嬗变;三是要按照农林经济管理的学科范围,将政策性概念分别划分到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与管理、食物经济与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农村发展和农商管理等类别,从而为后续专业化科学研究与理论知识构建提供清晰的政策性概念谱系。

### (二)从政策性概念到规范性概念:面向理论构建的学理升华过程

规范性概念是围绕理论知识构建展开的政策性概念的学理升华过程,集中打造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理论效力。概念是理论构建的基石,从定义明确的概念出发,经过判断、推理与论证等科学研究过程,来揭示概念背后客观社会现象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再以陈述的方式加以呈现就形成理论层面的知识<sup>[25]5-8</sup>。提炼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关键环节就是,政策性概念能否经由严谨的科学研究来形成理论知识,能否以学理化再造升华至符合学术规范的规范性概念。对于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而言,政策性概念到规范性概念的学理升华要注重问题层面的现实导向和方法论层面的创新。首先,需要树立直面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导向。科学研究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的能力决定了理论构建的可能。当前,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已经掌握西方农经学界较为完整的理论知识结构,但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强行解释中国农业农村本土发展实践的现象,造成问题描述现象化、话语议题离散化和分析理解碎片化等问题<sup>[26]</sup>,唯有从实践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才能形成新理论<sup>[27]</sup>。发现新问题的

前提是要全面把握西方农经学科理论知识呈现的基本原理,结合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经验事实的理解,寻找西方农经理论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践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以此为突破口开展科学论证并加以合理解释,才能形成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的理论知识<sup>[28]</sup>。其次,需要在方法论层面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适当创新。受到西方农经学界的影响,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方法论上主要依赖经济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sup>[29]</sup><sup>[14]</sup>,这套方法论根据个人功利主义的哲学观将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刻画成理性经济人<sup>[30]</sup><sup>[12-13]</sup>,理性经济人假设在经过了舒尔茨关于农民“贫穷但有效率”的论证后,被普遍视为研究农民行为方式的前提假设<sup>[31]</sup><sup>[69]</sup>,但这一假设却无法用来解释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中,农民家庭为保证生存需要所做的种种非经济利益最大化行为,经济理性也因此被延伸出“安全第一”原则下的生存伦理假说<sup>[32]</sup><sup>[31-32]</sup>。以上分析的启示是,通过理论构建将政策性概念升华为规范性概念,既要在研究选题上锚定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真问题,也要适当创新方法论使新的理论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现实。

### (三)从规范性概念到标识性概念:走向理论对话的中国智慧传播

标识性概念是通过深度理论对话的形式来全面发掘规范性概念的理论贡献,最终实现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智慧传播。规范性概念是政策性概念学理升华后的结果,内涵上延续了政策性概念具备的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经验事实的指向性,而科学研究与理论构建过程又进一步证实了规范性概念对理论知识形成的有效性,这些特征在本质上反映出规范性概念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论假说性质。但是,以规范性概念为基础形成的理论知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农业农村本土发展实践提供学理化阐述的理论创新,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被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偏向的主流学界普遍接受与认可,甚至围绕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实践打造的理论研究成果会被西方主流学界视为某种个案或特例<sup>[33]</sup>,这种不平等的学术话语地位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当然,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对中国经验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要将中国特色理论与西方主流理论进行深度对话,全面揭示中国特色理论的贡献性或颠覆性,从而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正名。理论对话需要从假设前提、概念以及由概念推演出的结论三方面展开。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中,围绕“三权分置”这一概念构建出的土地“三权分置”理论,无论是对现有产权理论产生的冲击力,还是对中国或世界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力,都可以通过深度理论对话来证明其是产权经济学领域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sup>[34]</sup>。具体来说,产权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逻辑主线,在私有制背景下探讨产权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关系,“三权分置”则按照产权的可分解性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这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底线,形成了承包权的“准所有权”性质以及经营权的流转权能,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稳定的基础上,还通过土地流转来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要求,由此打破了私有产权对资源有效配置的决定性作用<sup>[35]</sup>。显然,通过与西方产权理论的对话,“三权分置”理应成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的一个标识性概念,并且这种理论对话也是将规范性概念真正提炼成标识性概念的最后一个逻辑环节。

## 四、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结构特征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三化一融”一体设计、一并推进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农业农村发展实践经验。由此,以农业农村发展经验事实为现实关照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就不是一个个单独存在的“概念孤儿”<sup>[36]</sup>,而是以系统化的方式加以构建的概念体系。针对系统化构建,一般系统论指出,系统是由不同数目、不同种类的要素按照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组成的复合体<sup>[37]</sup><sup>[50-51]</sup>,任何一个系统都

有自身的结构,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的联系方式、组织形式以及时空关系决定了一个系统的结构特征<sup>[38]288</sup>,系统论的观点为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提供了重要启发。按照《心理学大辞典》的定义,概念体系是“根据概念的不同抽象程度和概念之间的关系排列而成的概念系统,由垂直和水平两个维度构成,垂直维度排列了因对事物的抽象程度不同而形成的不同层次的概念,水平维度排列了同一抽象水平上的相互有联系的概念”<sup>[39]379</sup>。构建概念体系的关键是要了解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具有的内在结构特征<sup>[40]</sup>,因为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必然存在基本的结构问题,所以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也要首先明确其自身的结构特征,这样才有助于廓清概念体系的全貌。遵循概念体系的基本定义,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在层次性和关联性两个方面,即垂直维度不同抽象程度概念的从属关系形塑了概念体系的层次性特征,水平维度同一抽象程度概念的交叉关系展现了概念体系的关联性特征。

### (一)垂直维度:概念从属关系形塑概念体系的层次特征

在概念体系的垂直维度上,存在一系列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这些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通过从属关系实现纵向连接,并按照概念抽象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进行排列,形成概念体系的总括层次、基本层次、类属层次等层次性特征。垂直维度不同概念之间抽象程度的差异,本质上是由概念内涵所包含的事物特有属性的多少来决定的,概念内涵所包含的事物特有属性越少,概念的抽象化程度就越高,反之亦然。比如,相较于“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由于增加了“农业农村”的产业和地域限制,其所能包含的事物特有属性就多于“现代化”,结果是“现代化”的抽象程度要高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此同时,垂直维度不同抽象程度概念的从属关系是按照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建立的,其中,从属关系可以分为上属关系和下属关系、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均是为了说明垂直维度上不同抽象程度的概念如何通过外延之间的这些关系进行连接。回到“现代化”的例子,“现代化”的外延可以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域的“现代化”,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外延只能是在“农业农村”基础上的任何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所以“现代化”的外延包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外延,在概念的从属关系中,既可以说在“现代化”上属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或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下属于“现代化”,还可以说“现代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上位概念”,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下位概念”。如果在“现代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概念中加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那么,“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就在概念体系垂直维度上呈现一种抽象程度由高到低,依次具有从属关系,可以分别归属总括层次、基本层次、类属层次的一组概念,这也形塑了概念体系垂直维度上的层次结构。

### (二)水平维度:概念交叉关系展现概念体系的关联特征

概念体系水平维度上由一系列同一抽象程度的概念组成,这些抽象程度相同的概念通过概念之间的交叉关系进行连接。所谓“交叉关系”就是不同概念外延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合,但又不完全重合的情况。举例来说,“农民”“农民工”“市民”这三个概念在事物特有属性所指方面,均包含了人口的户籍、居住地、就业性质等方面的内容,在概念内涵意义上属于同一抽象程度的不同概念。首先,单独考虑“农民”和“市民”这一对概念,“农民”是有农村户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市民”是有城市户口、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人。不难发现,“农民”和“市民”概念定义项中的所有元素都是二元对立关系,由此两个概念的外延之间就不存在任何重合或交叉,这是概念之间一种较为特殊的按照二分法进行划分的“全异关系”。其次,如果在“农民”和“市民”的例子中加入“农民工”概念,“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人,与“农民”的概念相比,概念的内涵均有农村户口这一特有属性,但二者居住地和就业性质又完全不同,所以“农民”和“农民

工”概念的外延存在一定的重合性,是交叉关系概念。类似的,“农民工”和“市民”概念的内涵都包括居住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特有属性,又因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异,使“农民工”和“市民”两个概念的外延存在交叉关系。最后,通过发挥“农民工”这一概念的结点作用,就可以把“农民”和“市民”这两个概念在水平维度上进行相互连接,形成概念体系水平维度上具有同一抽象程度的“农民”“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关联性。需要强调,水平维度上的概念也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结点位置,在垂直维度上继续发散,比如“农民工”概念在垂直维度又属于“本地农民工”“省内农民工”“跨省农民工”等概念。也就是说,垂直维度和水平维度相交处的概念往往具有重要的结点效应,围绕这些结点就可以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概念语义网络,这一语义网络的不断发展最终就能廓清概念体系的全貌。

## 五、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构建策略

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归根结底是要在整体上把握不同标识性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一逻辑关系深深根植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并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为主要载体,按照层次性和关联性的结构化思路来加以系统化、体系化的呈现。因此,在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一方面,要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引领,深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将历史发展逻辑转化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时序逻辑;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农林经济管理的交叉学科优势,在学科范围内扎实推进基础知识研究、前沿知识研究,并突破学科范围边界开展交叉知识研究,着力打造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纵横交错的语义网络。

### (一)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引领,建立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时序逻辑

任何历史时期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凝聚在反映该时期社会发展特征的概念之中,对不同概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把握,也就是探讨它们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存在的深刻而又微妙的联系<sup>[41]</sup>。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是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历史的逻辑综合再现,而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理念、定位调整与内涵拓展,有助于在概念体系的垂直维度上,按照一致类、阶段类和演进类的类别划分策略,实现标识性概念之间的纵向连接,从而呈现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时序演变逻辑。具体而言如下。

第一,将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理念凝练成一致类标识性概念。一致类标识性概念是指存在于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并且内涵长期保持稳定的“全同关系”概念,这也是对农业农村发展核心理念的凝练。比如,在农村土地制度方面,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贯穿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个发展历程,制度红利的巨大释放引发了一系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sup>[42]</sup>。尽管当前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长期保持不变的制度底线,“集体所有权”就成为土地产权领域的一致类标识性概念。并且,一致类标识性概念需要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理念展开深入研究。

第二,将农业农村发展的定位调整转化成阶段类标识性概念。阶段类标识性概念是按照概念本身的退出情况为划分依据,这是对农业农村发展定位调整的历史刻画。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服务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农村地区建立起农业集体经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等制度安排。改革开放后,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家庭经营重新回归,“农业集体经营”“粮食统购统销”以阶段类标识性概念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需要强调,虽然阶段类标识性概念随着农业农村发展的定位调整已完成其历史使命,但仍在农业农村发展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对标识性概念体系不可或缺。

第三,将农业农村发展的内涵拓展连接成演进类标识性概念。演进类标识性概念是指概念内涵不断发展、丰富,概念语词可能存在变化的从属关系概念,主要反映了农业农村发展内涵的拓展情况。比如,在农村建设方面,“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包括“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随着国家对农村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入,“乡村振兴”接续“新农村建设”的使命,并将内涵拓展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即属于演进类标识性概念。诸如此类的还有“农业生产力”和“农业新质生产力”、“城乡一体”和“城乡融合”等。

## (二)以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优势为依托,打造标识性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

学科是生产现代科学知识的主体,知识生产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现象发生机理的理解,还将不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以概念的形式加以连接。农林经济管理是一门交叉属性极强的学科,学科范围包括农业经济与管理、林业经济与管理、食物经济与管理、自然资源管理、农村发展和农商管理等,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农学、环境科学等多学科理论,这决定了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具有多维解释农村经济社会现象发生机理的学科优势。因此,按照基础知识研究、前沿知识研究和交叉知识研究的顺序,有助于构建起标识性概念之间的语义网络。

首先,以学科基础知识研究为出发点,形成标识性概念的初步关联。学科基础知识研究就是要在学科范围内,系统阐述标识性概念所指农村经济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并形成基础性知识来将标识性概念进行初步连接。比如,农民工属于农业经济与管理中关于农民问题演进规律的概念,理解农民工现象产生的原因需要站在历史语境中,结合户籍制度的产生、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乡村工业化的形成、沿海工业化的兴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一系列视角,对农民工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行充分解释,由此围绕农民工问题生成的基础性知识,可以将农民工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乡镇企业、工业化、劳动力转移等概念进行初步连接。

其次,以学科前沿知识研究为关键点,推动标识性概念的深度联结。学科前沿知识研究是在学科基础知识架构之上,以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参照系,围绕独具中国经验事实指向性的标识性概念,深入探讨如何从这一概念出发来形成符合经济规律的新的理论知识,而借助新的理论又可以进一步连接不同的概念。针对农民工这一现象而言,经济结构转型的一般规律表现为经济活动从农业到工业、再由工业到服务业的转移<sup>[43]</sup>,那么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就构成一个学科前沿问题,这就需要结合土地权益保护、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既可形成农民工市民化理论,还能将理论中运用到的不同概念进行深度联结。

最后,以学科交叉知识研究为落脚点,打造标识性概念的语义网络。学科交叉知识研究就是在学科范围边界之外寻求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激发新的问题发现意识、形成交叉学科理论知识,从而以理论交叉创新来打造标识性概念的语义网络。比如在农业经济史中,农业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突出问题,环境通过土壤、温度、天气、降水、病虫害等方式影响农业产出水平<sup>[44]</sup>7-10,通过与农学、环境科学、生物学等开展交叉研究,可以产生土壤养分保护、预防农业病虫害等交叉知识。同时,学科交叉知识研究还能不断激活在标识性概念体系中具有结点效应的概念,结点概念的发展壮大最终勾画出标识性概念的语义网络。

## 六、结 语

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不仅是构建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

基础,更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回望历史,现代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西方世界建构起来的一套发展话语权力和理论叙事体系,并以发展主义之名在全球范围内大行其道<sup>[45]</sup>3-13。发展主义将普适化的经济增长逻辑塑造成人们的共同信仰,带有明显城市政策偏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试图为地方性问题提供全球性解决方案,这种发展话语极大压缩了根据地方特色进行发展创新的空间与可能,任何基于地方性的实践探索均被认为是对主流发展道路的偏离,甚至会被冠以“非主流”发展之名来对其加以纠正。当今世界,发展主义理念驱使下的发展政策与发展实践并未兑现最初的承诺,反而带来发展中国家农业农村边缘化和城乡关系普遍失衡等问题,造成发展成果集中在城市,发展代价却由农村承担的困境。但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对发展主义主流话语叙事的深刻反思,围绕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等多元化目标,力求在“后发展主义”时代建立以全体人民根本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引领下,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理应自觉深入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充分发挥自身交叉学科的优势,以构建标识性概念体系来推进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正如历史上的德国在引入英国古典学派后不久,便以本国文化为背景形成了历史学派,美国也因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国内发展出了自身的制度学派。在历史发展的当下,基于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丰富的本土化实践经验,中国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完全有能力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经学派。

#### [参 考 文 献]

- [1]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 [2] 韩震:《知识形态演进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168-185,207-208页。
- [3] [美]乔尔·莫基尔:《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段异兵、唐乐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 [4] 张东刚:《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90-104,206页。
- [5] [印]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吴伟东、韩俊、李发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 [6] 朱信凯:《以三农学推进农经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5期,第3-15页。
- [7] 叶敬忠:《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农业农村现代化: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5期,第2-20页。
- [9] 翟锦程:《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145-164,207页。
- [10] [美]华勒斯坦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 [11]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 [12] 张旭昆:《制度演化分析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3] 金岳霖:《形式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 [14] [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 [15]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第38-51,204-205页。
- [16] 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第72-89,205-206页。
- [17]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 [18] 杨春学:《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境遇:一种历史的考察》,《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0期,第11-23页。
- [19] [美]卡尔·G.亨普尔:《自然科学的哲学》,张华夏、余谋昌、鲁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 [20] [日]七户长生:《日本农业的经营问题——现状与发展逻辑》,俞炳强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

- [21] [荷]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新小农阶级:世界农业的趋势与模式》,潘璐、叶敬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 [22] 叶敬忠、汪淳玉:《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视角的农政问题及农政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11页。
- [23] 陆益龙:《百年中国农村发展的社会学回眸》,《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第44-62,205页。
- [24] 李培林:《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内生动力和路径选择》,《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7,226页。
- [25] [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
- [26] 罗必良:《构建“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农村经济》2020年第7期,第2-23页。
- [27] 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第4-22,204页。
- [28] 黄少安:《现实需要如何推动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5期,第41-47页。
- [29]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陈一民、季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 [30]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1] [英]弗兰克·艾利思:《农民经济学:农民家庭农业和农业发展》(第二版),胡景北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9年。
- [32] [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33] 刘守英、熊雪锋:《坚持问题导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第99-118,206页。
- [34] 黄少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经济理论创新》,《学术月刊》2019年第3期,第39-47页。
- [35] 黄少安:《中国为什么没有率先创建经济学》,《学术界》2024年第1期,第106-113页。
- [36] 徐勇:《事实与逻辑:成体系的概念建构》,《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2年第6期,第9-11页。
- [37] [美]冯·贝塔朗非:《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林康义、魏宏森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
- [38] 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年。
- [39] 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 [40] 程霖、段博、刘凝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第84-104,205-206页。
- [41] 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9期,第11-14页。
- [42] 吴忠民:《农村历史性变革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第4-22,204页。
- [43] 杨先明、王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现代化: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0期,第24-37页。
- [44] [意]乔瓦尼·费德里科:《养活世界——农业经济史1800—2000》,何秀荣译,田维明校,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
- [45]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第二版),汪淳玉、吴慧芳、潘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

## Constructing the Iconic Concept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Qian Wenrong Shen Xiaoliang Zhao Zongyin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Constructing the iconic concept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 not only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this field but also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undamental meaning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iconic concepts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logic behind their

extraction. On the other hand,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e structural features of the iconic concept system within the discipline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ts effective construction.

Iconic concep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irectly address the typical realities of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These concept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orientation toward Chinese experiential facts, their effectiveness in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ir capacity to disseminate Chinese wisdom. Based on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general concepts, the iconic concepts in this discipline mainly comprise three aspects: appropriately constructed conceptual terms, clearly defined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and distinctly delineated conceptual denotations.

A complete logical pathway for refining iconic concepts in the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an be constructed as follows, extracting policy-related concepts from policy keywords, elevating these policy-related concepts into normative concepts through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ultimately transforming them into iconic concepts through theoretical dialogue. Specifically, policy-related concepts are oriented toward empirical facts rooted i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The proces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f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concepts in generating scholarly knowledge. As such, policy-related concepts are elevated to normative concepts that meet academic standards. Furthermore, through dialogue with existing theories, normative concepts can be developed into iconic concepts that encapsulate and disseminate the wisdom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iconic concept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s constructed along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mensions, linking iconic concepts longitudinally and laterally to form a large-scale semantic network. This net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structural hierarchy and interconnectivity. For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is concep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key strategies. First, guided by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delve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nsforming its developmental logic into a temporal logic of iconic concepts. Seco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fully leveraged. This involves deepening research on both foundational and frontier knowledge within the discipline, expanding its boundari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and ultimately building a semantic network of iconic concepts that clarifies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conceptual system.

**Key words:** Chinese-styl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discipline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conic concept; system construction

